

“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压力与解决路径

赵福昌 侯海波 宋衍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十四五”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面临整体财政紧平衡压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自身特殊需求双重影响,多因素叠加带来收入压力,支出增长刚性不减并且新需求不断增加,财政举债空间有度,财政保障的紧平衡压力和矛盾前所未有。做好“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保障,需要强化政府过“紧日子”思想,秉持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科学确定财政支出水平,合理排序、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资金绩效,完善治理机制及健全制度和技术等支撑基础,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关键词:“十四五” 基本公共服务 财政紧平衡 统筹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1-0013-07

“十四五”是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交汇期,是外部环境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面临诸多挑战的重要时期,是经济下行条件下社会问题凸显的窗口期,经济下行压力、社会问题凸显与外部不确定性叠加,财政平衡压力和矛盾前所未有。基本公共服务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在财政保障中居于优先位置。我国长期高速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鲜明等都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坚实基础,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十四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压力凸显,既有整体上财政的压力,也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特殊压力,需要本着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确定财

政支出水平,合理排序、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资金绩效,完善治理机制,健全制度和技术等支撑基础,多措并举,在既定收支矛盾压力下做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保障。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压力凸显

经济和财政收入下行压力犹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内部经济下行等需求不减,人口老龄化压力不断显现,等等,“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压力十分突出。

(一)多重财政收入压力叠加

1.财政收入增长压力日益增大。财政收入增长

[收稿日期]2020-11-07

[作者简介]赵福昌,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侯海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宋衍蕾,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体制。

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承压,制约财政收入增长。一方面,经济下行带来财政收入增长压力。我国经济尚处于下行通道中,叠加国内经济转型、新冠疫情、外部经济放缓等不确定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潜在增长率将受影响。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供给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供给下降将会引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面临下降的压力维持一定时间,必然会对未来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综上,经济和劳动力供给形势,表明未来“十四五”时期处在下行通道的基本格局将会持续,这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会带来较大压力。

2. 减税降费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冲击。在前几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2019年和2020年又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全年减税降费都分别超过2万亿元。而有一些减费降费措施,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如社保的降费,虽然不会马上全部变为时下的财政压力,但将会转化为未来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的负担。而长期性的、制度性的减税措施必将在长期里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3. 可用的财政资源存量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可用的跨年调节入库空间在缩小,另一方面,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空间越来越小,近两年经济下行,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小,可用的存量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利用企业上缴利润也有限度。综上几个方面影响,财政收入存量资源的空间进一步收窄。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与“十三五”时期相比,经济下行、减税降费,以及财政存量资源空间的收窄,都将使“十四五”时期的财政收支压力空前严峻。

(二) 财政支出增长刚性压力加剧

“十四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压力日益增

加;财政收支结构优化空间收窄,部分非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需求也不断增加,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保障的空间也在收窄。

1.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现收现付制的基本养老保险带来压力。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年化社会,老年人口急剧上升,而年轻人口不断减少,“十四五”期间这种趋势将延续,导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呈扩大趋势。同样,对医疗保障支出也会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影响。当然对职工社会保险平衡而言财政只是补贴,而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则基本靠财政负担,并且养老和医疗服务的供给,等等,都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而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优化空间收窄。根据预算公开信息,选择中央和若干省份可以看到,一般公共预算结构固化问题突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基本支出比重越往基层比重越高,中央一般公共服务中基本支出占35%左右,基本支出中涉及人员待遇的支出占1/3左右,越往基层,这个比重越高,固化问题十分严重,简单地优化空间十分有限。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需求具有刚性,易升不易降。1992年至2018年基本公共服务走势一直呈刚性上涨趋势,而且近年来增速趋势不减,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形势形成鲜明对比。

3. 应对国内外新挑战带来财政支出压力。中美贸易摩擦,现有的分析,无论是贸易战、经济战,还是科技战或意识形态之战,都需要财政加大支出来应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海外投资权益的保障,甚至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些事项都需要加强与我国当前地位相适应的国防、海军力量,也是我国未来面临的财政支出压力。

4. 经济下行背景下的经济社会需求压力凸显。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仅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刚性需求要保障,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各方对财政政策稳经济和社会支出的期望更加高涨,对财政支出带

来压力。此外，三大攻坚战中的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等，也亟待财政加大支出。

5.国际比较看，未来支出压力不小。根据世界银行、OECD 等机构网站数据，结合各国的阶段特点，选择美国的 1977 年、韩国的 1994 年 and 中国的 2018 年，作为可比阶段进行比较。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丰富程度的提高，我国呈现经济性支出下降、社会性支出上升态势。从全口径的支出结构对比分析，财政教育支出所占比重相对稳定，1977 年美国、1994 年韩国和 2018 年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占比都在 16%—18% 左右，趋势也相对稳定。但健康和社保方面差别较大，仅健康支出比重就呈翻倍的态势，如，美国 1977 年占比 10.71% 左右，发展到 2018 年占比翻了 1 倍多，达到 24.58%；韩国从 1994 年占比 6.1% 左右，快速增长到 2016 年的 13.2%，20 多年健康支出翻了 1 倍，对于中国医疗保障未来的需求压力是一个明显的警示；社会保障支出增速预期较快，就一般公共预算而言，中国社保支出占比尚低，但从全口径预算看，中国的社保水平不仅高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美韩，甚至高于当前大多数 OECD 国家。而这些都属于未来增长较快的支出项目，预示着未来发展中压力不小。

（三）财政举债的空间约束凸显

1.债务付息和发行费负担日趋增加。从债务付息发行费的增长看，2015 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9 年债务付息和发行费用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3.3% 以上，在“十四五”时期，随着债务规模的积累，债务付息压力进一步加大。

此外，按照总量预测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2020 年到 2025 年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大致稳定在 25%—28% 之间，但是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缺口占 GDP 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将由现在的 4% 逐步上升到 2025 年的 7% 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调入收入调节空间再进一步减少的话，预算赤字将会接近 7% 的水平。总体上财政收入矛盾将成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总制约。

2.过度举债将影响代际公平，削弱中长期发展潜力。理论上，举债一方面可以逆周期调节，平滑经济波动，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消费、投资等，新古典综合派在二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认为政府举债会影响未来消费，长期财政赤字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资本形成。消费领域过度举债也会影响日后消费，近年来已有不少计量论文分析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短期内（1 年）举债会刺激消费增长，但是长期（1 年以上）里居民杠杆率的提升会使消费增速下降。2019 年 7 月央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显示，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 1 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 0.3 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在看到我国举债空间的同时，更要重视举债发展对未来的影响，赤字超过一定限度，可能会既增加了债务付息的负担，又会削弱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面临一个财政预算平衡趋紧的态势，收入下行和支出刚性导致矛盾日益加大，而同时解决“十四五”期间的各种矛盾导致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加大，进一步挤压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空间，收支矛盾将进一步加大。

二、“十四五”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保障的总体思路 and 原则

（一）总体思路

要做好“十四五”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安排，需要科学分析财政形势和格局，政策既要有利于财政保障到位和自身可持续发展，又要主要保障经济早日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需要强化量入为出理念，结合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需要并借鉴国外经验进行合理的收支排序，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具体的结构安排和保障力度，在财政保障上既要充分利用财政可用的增量空间，统筹财政收入

的税、费、债、利四种收入权的空间,特别是债权方面在兼顾经济财政安全的情况下,统筹一般债和专项债的空间,“利”的方面既要重视国有企业利润的调入,更要注重存量资产的划转弥补社会保障等历史欠账以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在上述空间充分利用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管理效率和绩效,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能,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上述合力共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

(二)基本原则

“十四五”时期,做好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保障,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尽力而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指数化理念适时调整国家基础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又要量力而行,强化量入为出的理念,突出财政过紧日子思想,科学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水平;同时,又需要兼顾各级财政承受能力,体现因地制宜要求,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既要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到位影响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更要避免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过高承诺福利水平。

2.既要着眼当前,又要考虑长远。既要着眼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期盼更好的教育、医疗卫生,更高的社会保障,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等,要尽力在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提高服务标准;又要考虑长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很大的制度惯性、需求刚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财政需求压力将会逐年显现,因此不但要考虑当下的财政承受能力,还要增强财政的预见性,保证在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可能的财力做好当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3.既要争取流量,又要用好存量。流量财政资源和存量财政资源都是可用的财政资源,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既要争取流量,充分利用财政流量收入资源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又要利用存量,比如可用的国有资产、资源,通过资产划拨或现有存

量资源如房屋设施等的结构调整,用于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保障,存量流量资源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合力。

4.既要着力保障,又要改革降本。保障是财政的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应把基本公共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应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充分挖掘潜力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同时,又要注意改革降成本,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保障高效的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相反,保障低效或问题比较多的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通过改革有效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进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提质来做好保障。

三、“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财政收支压力超过以往,而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目标,又对财政支出提出很高的要求,根据上述思路原则,“十四五”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保障建议如下:

(一)强化统筹,提升财政重点保障能力

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是“十四五”时期财政保障的重要举措。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一是做好四本预算的统筹和衔接,加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以及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力度。二是统一预算分配权,着力解决“二次分配权”和彻底落实取消挂钩的问题,增强预算编制的宏观统筹。三是做好财政预算全过程管理,盘活存量,强化结转结余资金的统筹使用。四是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切实发挥相应约束和指导作用。五是做好流量财政资源和存量资源的统筹,强化财政资源管理,将存量财政资源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此外,还要促进业务部门和项目之间的协同,促进部门或地

方政府职能配置优化和运行协同化；创新政策，强化主体责任，强化机制，实现中观统筹；加强管理，促进项目资金充分、有效利用，突出绩效管理，做好微观统筹。这样多方面统筹协调推进，配以财政管理制度健全和技术改进，共同促进财政资金充分有效利用和财政可持续发展，在保障重点的基础上，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腾出更多空间。

（二）量力而行，合理控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

“十四五”时期财政收支压力超过以往，因此，做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安排，需要科学合理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根据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在处于我们目前发展水平阶段的经验，要体现保障与改革的结合，做到流量与存量并用，适度控制中国“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首先，要基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如经济层面的消费、投资、进出口情况，显然仍然偏倚财政保障，经济企稳仍待观察；存量财政资源只会越用越小，而债务水平虽有短期刺激效果却会损害长期增长潜力，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发展；以及其他因素考虑，等等，“十四五”时期财政紧平衡将贯穿始终，支出政策安排要体现稳增长的需求，又要体现财政可持续的谨慎要求，根据测算，建议适度控制基本公共服务目标保障水平，既要防止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影响社会稳定（考虑人口老龄化因素），也要防止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过多导致的制度惯性和过高承诺导致的福利陷阱等问题（考虑收支标准因素）。

其次，具体形势而言，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收入增长3.8%，低于预算目标，支出增长8.1%，高于年初预算目标，执行中留有6000亿元缺口，即使有减税降费等因素冲击，足以说明财政紧平衡的压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趋势预测，“十四五”期间平均支出水平高出平均收入水平大致1个百分点，而基本公共服务则比收入和支出水平更高。考虑到

“十四五”期间财政收入调节的资源空间有限，又要尽量避免债务水平上升过快，应该适度控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的增长率。

综合考虑到国际经验，韩国和美国的养老和医疗费用在得到人均1万美元之后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际比较看，我们卫生总费用比重和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已不算低。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医疗健康和养老还会进一步增长。所以控制基本公共服务增长率的时候，要注意体现养老和医疗随人口老龄化等影响增长的因素。应该合理控制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目标水平，人口老龄化增长的待遇要保障，但是需要加强控制提标增加的支出。

（三）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内部结构，提升保障能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发生变化，典型的就在教育和老年服务方面，可以考虑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存量资产结构优化满足需要。根据前面分析可知，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老年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但是年轻人口或学龄人口可能趋于稳定甚至会逐步降低，这样，即使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总量控制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支出结构优化来满足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需要。在我国长期执行教育支出与GDP挂钩的情况下，随着GDP规模的快速增长，一些地方出现教育经费花不出去或是支出低效的情况，同时也存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或迁徙等原因导致的支出与服务对象不匹配的情况，调研发现，有些地方教育支出效率低下，如学生不足，老师实行倒班制，工作量并不饱和。所以，“十四五”时期可以充分利用人口结构等变化带来的教育支出优化调整的空间，用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同时，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房屋等资产资源闲置也可以优化配置结构，可以在基本公共服务大类之间调剂优化，如人口减少对学校校舍减少的需求，可以支持养老服务。总之，存量流量资源并用，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合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

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要基于基本民生的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重点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覆盖全部户籍人口,同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同等水平常住人口全覆盖,并引导公共服务资源向广大农村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对于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标准水平既不得低于国家标准,也不得脱离实际盲目攀高,切实避免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急功近利、大包大揽,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四)深化制度改革,降低或“锁定”财政责任

在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政策时,在既定的发展判断基础上,需要打破静态固化思维,既要尽量保障,又要注意通过改革发展来促进保障,不要将问题矛盾的解决囿于一时,更不要想毕其功于一役,要善于通过改革创造空间和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更加规范。“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制度设计上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防止道德风险。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除了增强财务筹资能力,还要强化制度改革,抓住降低缴费率的契机做实基数、适时提高退休年龄或延长缴费时间等,实现制度的规范性;同时,还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通过这些改革,可以有效地减轻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明确制度理念,明确各主体权责,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做到激励相容,也有利于保障政策落实。防止目前调剂金统筹的格局下,缺口区域依赖中央,而结余地区则会加快结余的使用,以减少被调剂,发生道德风险。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使得我们现在本就不足的社会保险积累面临更大的难题。

第二,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理念,限定财政责任。制度规范可能还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要彻底解决养老保险制度问题,需要回到改革之初的理念,即强调的保险的精算平衡。但是,改革初期制度涉及“老人”、“中人”和“新人”,“老人”和“中人”是没有完全缴费的,这也是现在财政补助或注入国有资

产的理由,定性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缺乏定量的数据,使财政陷入补贴兜底的无底洞之中,因为当初该补缴费用多少,没有清晰的计算出来,形成了一个滚动补贴的格局。由于当初缴费不全的人群该补缴多少没有数据,使社会保险的精算失去基础,使本该在精算平衡下的财政“有限补贴责任”,慢慢变成随缺随补机制下的“无限补贴责任”,不利于财政支出的控制。“十四五”时期应突出社会保险的保险精算理念,以此厘清财政责任。由于制度的“老人”是没有缴费对应的,“中人”是缴费不足的,这些人工作期间没有缴费的时期对应的是形成了存量国有资产,现在要做好这些人的保障,就需要动用存量国有资产,来予以保障。厘清的财政责任,可以动用国有资产补齐,保险理念直接影响上述划拨国有资产的边界逻辑,之后严格按照精算平衡的理念控制财政补贴责任。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的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责任,将会是无底洞,如果再叠加不能实现全国统筹而导致的道德风险使有限的结余过快消耗,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代际平衡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第三,需要对居民养老保险重新思考。注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问题,如居民养老保险,到底是保险的理念还是福利的理念,直接决定着此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如是保险理念,需要自求平衡;福利的理念,则重在资格管理,做到理念逻辑和管理的有机统一。

第四,需要做好医疗保险的控费工作。根据国际经验,医疗健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费用增长是比较快的,在现行体制下并不体现为财政的压力,如果这种格局不变,城乡居民的医疗健康支出会较快增加,近两年,城乡居民医疗健康支出增速都快于当年现金支出增速,由此可见现行体制下,财政压力不大,但要注意医疗总费用上涨的问题。

(五)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发挥财政杠杆作用

“四两拨千斤”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方

面,在充分运用财政增支、减税政策的基础上,还需要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上,要充分利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 and 市场的力量,创新方式做好公共服务保障。

在保证政府承担公共服务主导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模式,有效解决某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

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把一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生产的公共服务事项,剥离给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或营利性组织,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费用,由“养人”向“办事”转变。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制定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内容和方式;明确对承接主体的资格要求。提出绩效评价标准,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评审小组,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等,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政企合作、政社合作。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通过特许经营、招标采购、合约出租、政府参股等形式,拓展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渠道。积极引导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利用商业保险机制解决社区管理、特殊人群救助等问题,发挥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的作用,使救助、福利、保险等优势互补,建立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人多渠道参与的全方位保障体系。通过试点创新以 REITs 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融资模式,构建适合我国住房保障情况的 PPP 建设模式,通过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捆绑开发等形式吸引私人机构投资公共保障住房建设。

(六)强化政府过紧日子,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很多,通过其他类支出大幅压减为基本公共服务腾出空间的余地有限。在有限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空间前提下,需要减支与调结构并行,盘活存量,用活流量,有保有压,既要压缩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也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财政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以此腾出空间,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突出财政要过紧日子,绩效管理既是财政管理的重点,又是基本公共服务资金管理的重点。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充分发挥好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作用,提升资金使用绩效也是重要的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绩效,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政策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 [1] Auerbach,AJ.,J. Gokhale,L.J. Kotlikoff,1991. Generational accounts;a meaningful alternative to deficit accounting. in D. Bradford,ed. [J].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5):55-110. Cambridge,MIT Press.
- [2] Auerbach,A.J.,J. Gokhale,L.J. Kotlikoff,1992.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id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al accounting. in J. Poterba,ed. [J].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6):129-145. Cambridge, MIT Press.
- [3]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国际比较[J].财政研究,2007(10).
- [4] 任全民.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 ARDL—ECM 模型[J].吉林金融研究,2019(10).
- [5] 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9(1).
- [6] 谢旭人主编.中国财政 60 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 [7]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J/O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862882/index.html>.

【责任编辑 陆成林】